

国学新知文库

詹石窗 主编

现代新儒学与自由主义

徐复观殷海光政治哲学比较研究

谢晓东 著

殷海光

徐复观

东方出版社

现代新儒学与自由主义

——徐复观殷海光政治哲学比较研究

谢晓东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新儒学与自由主义——徐复观殷海光政治哲学比较研究/谢晓东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4

ISBN 978-7-5060-3083-0

I. 现... II. 谢... III. ①新儒学-研究②自由主义-研究 IV. B244.05;D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1898 号

现代新儒学与自由主义

XIANDAI XIN RUXUE YU ZIYOUZHUYI

——徐复观殷海光政治哲学比较研究

谢晓东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635 毫米×927 毫米 1/16 印张:22

字数:302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978-7-5060-3083-0 定价:55.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总 序

“国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其中所谓“国学”实际上是指上古时期国家设立的学校。随着历史的进展，“国学”的内涵逐渐发生演变。到了近现代，“国学”成为指称我国特有学术的一个术语，其外延是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涉及古代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学、科学等诸多领域。本文库正是从广义上使用“国学”概念的，至于“新知”既意味着新的领域、新的视野，也意味着新的探索、新的认识。由于国学的范围相当广泛，这套文库当然应该有所选择，关注那些具有新发现、新观点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将“国学”与“新知”合成的用意所在。从文稿选择的立场看，既然是“国学”，则入选的文稿必定是传统文化方面的；既然是“新知”，文稿如果仅仅反映传统文化内容，还是未能符合要求的，必须是两个方面的特质兼备，才能进入这套文库之中。也许组织者对文稿的选择不一定准确，但不论情况如何，“新知”乃是编纂这套文库的初衷，表达着一种愿望、一种追求，一种目标。

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们不会忘记，近现代的“国学”概念是为了与“西学”相区别而建立起来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轰开了古老中国的沉重大门。在列强的枪炮声中，西学伴随着传教士的脚步，悄悄地在中华大地上播衍。1894~1895年，甲午中日海战，历来以幅员广大、礼仪之邦自居的中国败给了地域狭小的以资本主义文明武装的东邻日本。这场战争震惊了中华民众，许多学人开始质疑传

统文化的经国效用，转而羡慕西方文明的强势。20世纪初，由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把矛头指向封建文化。在激烈的破“旧”热潮中，一些仁人志士忧心中国文化命脉的延续问题，遂倡导整理国故，发掘国粹，如1905年2月23日创刊的《国粹学报》、章太炎创办的“国学讲习会”等均体现了此等努力方向。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设立国学门和国学研究院，为国学热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22年1月，北京大学创建国学门，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早以欧美研究机构为模式建立起来的研究所，也是在“整理国故”、“学术独立”的呼声中第一个以国学研究为主旨的学术根据地。其后，1925年9月，清华研究院国学门诞生。这两大国学专门研究机构，延聘王国维、陈垣、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等为导师，汇聚文史哲的诸多一流学者，培养了一大批国学人才，他们办会编刊，著书立说，以维护中华学统为己任。学术先辈们的丰硕成果和弘扬民族传统的执著精神展示了一种思想境界，也为当今我们组织编纂《国学新知文库》提供了精神资源与可以借鉴的经验。

如果说任何一种计划都有特定文化因缘的话，那么我必须承认厦门大学早期的国学研究传统乃是组织编纂《国学新知文库》的原初动力。早在1926年10月10日，厦门大学就创办了国学研究院。当时的校长林文庆自任院长，并且敦聘久负盛名的沈兼士先生任研究院主任，林语堂先生任研究院总秘书，张星烺先生、顾颉刚先生、鲁迅先生等名家任研究院教授。沈兼士等先生前来厦门大学之后，把国文系改称为国学系，拟以国学系作为国学研究院的依托，把国学教育与国学研究连接起来。当时国学研究院设置历史古物组、博物组（指动植矿物）、社会调查组（礼俗方言等）、医药组、天算组、地学组（地文地质）、美术组（建筑、雕刻、瓷陶漆器、音乐、图绘、塑像、绣织、书法）、哲学组、文学组、经济组、法政组、教育组、神教

组、闽南文化研究组；制定了详细的研究规划，包括研究生的招收与培养方案等；还筹办两种刊物，一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季刊》，一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后来季刊只编好创刊号，没有出版，周刊于1927年1月5日创刊，实际出版三期，发表文章十多篇；另外，也计划出版“国学研究院丛书”。可惜的是，由于校董陈嘉庚先生实业遭遇困难，经费紧缺，丛书出版计划最终没有付诸实施。回顾历史，我每每被厦门大学早期那些致力于国学研究的大师们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但也为当时“国学研究院丛书”的出版计划未能实施感到遗憾。多年来，学术先辈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感召着我。于是，有一种愿望慢慢在我的心中孕育、成长，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继续学术先辈的未竟之业，并且把他们的国学研究传统发扬光大。我思索着，追寻着，等待时机的到来。

在经历了文化冬天的严寒考验之后，“国学”终于迎来了生机焕发的春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沉睡了数十年的“国学”研究重新被唤醒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神州大地的国学热潮逐渐复兴，传统文化研究机构相继诞生。依托着这些研究机构，有关国学的研讨会、刊物、专著、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正是在新国学热潮逐步形成的文化大背景下，我在惜别16年之后重新回到母校厦门大学。1998年，我开始负责哲学系“中国哲学”方面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在教学之余，考虑最多的当然是怎样承袭和发扬沈兼士等前辈名家的国学研究传统，怎样进行学科建设的问题。从人力资源等方面来看，我们的学科建设尽管还存在着诸多困难，但可庆幸的是厦门大学领导给予有力支持，故而喜人的局面逐步形成。一方面，有关国学的研究机构，诸如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佛学研究中心、闽学研究中心等相继成立或者恢复加强，师资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有关国学研究的论著、丛书也陆续出版，例如《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易学与道教符号揭秘》、《道教医学》、《儒家文

化与中国古代科技》、《道韵》丛刊十二辑、《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库》(系列丛书)、《哲学新视界》(系列丛书)等问世之后都得到了同行的好评。经过了切实的努力,厦门大学的“中国哲学”专业于2003年获得博士授予权。2005年,厦门大学又获得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从而具有8个专业的博士点。与此同时,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文学、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艺术学等各个学科也不断积蓄实力,全院到目前为止已拥有20多个博士点,朝气蓬勃的学科群体与浓厚的人文氛围为新一轮的国学研究提供了资源保证与精神支撑。在兴趣、使命、学科建设需要的多重作用下,《国学新知文库》的编纂计划逐渐成形,并且见诸笔端。恰好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陈寒节先生的来信,他询问我关于近来研究计划的一些情况,我将《国学新知文库》的主要选题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他,经过几次电话联络和商讨,陈寒节先生告诉我可以将这套文库的出版计划提交出版社选题论证会讨论。不久之后,陈寒节先生通知我,人民出版社的选题论证会讨论通过了《国学新知文库》的编纂出版计划。欣喜之余,一种敬佩之情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我敬佩人民出版社领导的远见卓识,敬佩陈寒节先生的开阔眼界,感谢他的精心策划。

经过多方商讨与反复推敲之后,《国学新知文库》的编纂工作确立了如下宗旨:第一,弘扬求实精神,鼓励学术创新。众所周知,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必须具有求实精神,国学研究当然也不能例外。就过程而言,国学研究的求实精神首先意味着对从事的领域展开广泛的调查,精读相关的经典文献,详细占有资料,然后进行深入思考,避免信口开河,无中生有,有中说无,而是依据事实,客观陈述,立论稳妥。这种求实精神在节奏加快的当今学术圈中尤其需要。与此相联系,《国学新知文库》也特别强调学术创新。往昔的成就固然可以引为自豪,但重复劳动是没有前途的。唯有学术创新,才能永葆国学

的旺盛生命力，焕发学术研究的青春。所谓“创新”就国学领域来说，首先是文献史料的新发现、新发掘；其次也在于使用新的研究方法，从新的角度进行新的审视，提出新的选题，开展新的分析等等。古人称“天地日新”，又谓“革故鼎新”，此类格言成语说明我们的民族学术文化传统本来就非常提倡创新。在新的时代，尽管所谓“新”的标准不同，但先民们倡导创新的精神却依然没有过时，值得我们在国学研究工作中认真思考和发挥。

第二，扩展文化视野，兼蓄古今中外。从研究资料来说，我们不仅要熟悉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田野信息、考古资讯以及国内前贤时仁的论著，还要有世界眼光，努力掌握国外同行的学术动态，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海外对中华文化的研究越来越重视，成果也越来越丰硕。在文化学术传播越来越快的信息社会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了解他国学者的学术新成就，就可能步他人之后尘，重复无谓的劳动，甚至陷入迷乱状态，徘徊不前；唯有高瞻远瞩，放眼全球，关注他国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就，并且认真加以分析和借鉴，才能扬长避短，超越学术瓶颈，取得新的突破。

第三，关注薄弱环节，培植研究特色。经过长期的努力，国学研究在总体上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却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以往许多人谈国学，常常把它局限在儒家文化圈内。其实，此等视野是相对狭窄的。由于认识的局限和导向问题，国学研究未能在比较广阔的领域展开，故而限制了它的发展前景。有鉴于此，我们组织编纂《国学新知文库》不仅要继续关注儒家学说和中国化了的佛教文化，而且将加强对国学中的一些薄弱环节的探究，比如道家、道教之学、古代科技哲理、传统经学与艺术的关系等等，这些领域都是以往的国学研究相对比较忽略的，现在我们应该对这些领域的研究多加鼓励。从发展的立场来看，“强势”与“薄弱”本是相对而言的。当人们对于某个领域、某种专题不太关注而没有投入足够力量加以研究的时候，该领域或专题就是一种“薄弱

环节”，而当人们对这种“薄弱环节”有了足够重视的时候，“薄弱环节”就可能转化为“强势环节”。但愿我们的努力不仅可以化“薄弱环节”为“强势环节”，而且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培植新的特色。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就精神领域而言，大多数人却依然主张文化多元化，因为一个民族只有保存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傲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民，一方人民弘传一方文化”，既说明世界范围的文化本来就是多彩多姿的，也意味着文化“个性”乃是民族存在的基本标志之一。中华传统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曾雄踞世界东方，其中蕴涵的精神宝藏，特别是人文资源，可以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可是，晚清西学东渐以来，我国学术界主流倾斜于吸纳西洋、东洋文明，以追随西方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时髦，热衷于做西学的诠释者和传播者，却逐渐远离了对中华文化传统的认同。我们认为，富有情操的中国知识分子既要有宽广的胸襟和视野，敢于借鉴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时也应该坦然地开启心扉，理直气壮地为发掘国学的积极资源而大胆探索，奉献力量。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已经登上国际文化舞台，正在与西方学术进行平等对话，而且成为我国腾飞的强大精神载体，从而被西方世界所关注。美国科学史专家萨顿（George Sarton）说：“正如东方需要西方一样，今日的西方仍然需要东方。……不要忘记东西方之间曾经有过协调；不要忘记我们的灵感多次来自东方。为什么这不会再次发生？伟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机会悄悄地从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两臂欢迎它。对于东方科学采取粗暴态度的人，对于西方文明言过其实的人，大概不是科学家。……新的鼓舞可能仍然，而且确确实实仍然来自东方，如果我们觉察到这一点，我们会聪明一些。”^① 萨顿的论述无疑是深刻的，对于我

^① 《科学的生命：文明史论集》，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40～141页。

们的研究工作来说也是富有启迪的。

胡适曾经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说过：“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这是因为国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因应了时代的需要，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向前迈进。我们希望《国学新知文库》也能切近时代脉搏，在新一轮国学春潮到来并且逐步高涨的时候推波助澜。

詹石窗

谨识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2006年10月10日

序一

在谢晓东博士的论文即将出版之际，嘱序于予。我是他博士论文的评阅人和答辩主席，对该文比较熟悉，因而义不容辞。

徐复观和殷海光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对有名的“欢喜冤家”。作为新儒学和中国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徐复观和殷海光的政治哲学比较充分地表现了两大思潮的理论特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本书视为从政治哲学角度对现代新儒学和中国自由主义的研究。这项研究有利于政治哲学学科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可见，论文选题很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本书涉及中外政治哲学方面大量的基本资料，涉及两位代表人物的思想状况，因而写作难度比较大。通观全书，作者在理论和资料两个方面都较为出色，表现出较强的理论功底和扎实功夫。从理论上来看，作者对西方政治哲学很熟悉，理论准备比较充分。这就为论文的理论性准备了条件。从资料上来看，作者对徐、殷的论著比较熟悉，充分占有了第一手资料，使得论文的观点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在上述理论和文献的双重基础之上，作者比较了徐复观和殷海光政治哲学的异同，提出了颇有新意的学术观点，取得了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比如作者把徐复观定位为自由—保守主义者、新传统主义者，他致力于儒家政治哲学的重构和自由主义的中国化；把殷海光定位为新古典自由主义者，晚年放弃反传统主义而走向转化传统和强调自由主义与传统相结合的道路；对自由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思考与理论分析也是比较有价值的。作者既看到徐、殷政治哲学发展的基本差异和对

立，也看到他们的共同点，并且都回归到传统和自由主义关系的主题上。论文主题突出，理论结构严谨，条理清楚，思路清晰，语言通俗流畅，体现了作者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研究能力。本文介绍、分析徐复观和殷海光的观点全面、准确，评论公允合理。有启发性，创新点多。这是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领域内颇值得注意的一部论著。

在我看来，关于社会政治问题，要结合社会实践来讨论和评述，抽象地谈理论问题，无法得出恰当的评价。讲自由、民主和平等，也不能抽象地讲，必须结合时代国情讲。因此，我对论文提出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联系古今中外的社会现实，对两家思想予以分析评价。

我认为，让全部社会成员都能过上幸福生活，应该是人类最高理想，所有最高理想都是相通的。儒家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是相通的。现在流行的自由、民主、平等，也需要加以考察。在这些理念提出来以后，就在这些理念的欧洲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现在也有一些国家，将本国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上，为了本国利益，滥用武力，称霸天下，这就是孟子讲的“以力服人”的暴政霸道，不是“以德服人”或“以理服人”的仁政王道。凭实力，不讲道义，总是不会长久的。做人是这样的，作为国家也是这样的。政治哲学要研究的是如何治理好天下，“平天下”是儒家的远大目标。儒家政治哲学的起点是修身，以身作则，自己应该是社会的模范。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我做起”这是非常深刻的儒家传统。治理社会，不是“我改造你们”！持这种“我改造你们”的观念，你自由了，他们就不自由；你当老板，你说了算，老板可以炒雇员的鱿鱼，雇员就不能炒老板的鱿鱼，这哪有民主？这是强者与弱者的关系，哪有什么平等？自由平等民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主斗争提出的理念，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后来，这些理念也曾经为劳动者争取合法权利，争取幸福，有过贡献。更多的是资产阶级利用这些理念为自己谋利，甚至以此为棒子，打击别人，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冷战时

代，在冷战以后的单极时代，我们都看到那些强势者压迫弱势群体，形成当今世界上的最大的不公平，甚至激起反抗，不断出现恐怖事件，成为天下不安定的最大诱因。徐复观和殷海光的争论，中西思想的交流与融合，对世界文化的发展都是有益处的。谢晓东博士的研究，不仅在学理上有价值，而且在当今世界现实中也是有意义的。鄙人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多年，有些体会，就借此作序的机会，发一下议论，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周桂钿 丁亥年正月十一日序于北京师范大学三枣红楼

2007年2月28日

序二

大约四年前，当时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的谢晓东君来津与我联系考博事宜。在接谈五分钟之后，我就已经心许了他的报考。因为我从他的相关陈述中，已经对他在学业上的发展潜质有了初步的良好印象。后来他也不负所望，顺利考入南开。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考虑到当前学界的研究状况，也考虑到晓东本科是学法律出身，我们协商把选题确定在中国政治哲学方面，并最终确定为“徐复观殷海光政治哲学比较研究”。

在今天，无论是在欧美哲学界还是在中国哲学界，“政治哲学”恐怕都堪称是“显学”之一。特别是考虑到当前中国哲学界对于“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多多少少难免总是要以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参照系，这无疑也更增加了研究中国政治哲学的难度。按照“立足于学科前沿并做出创新性研究成果”的学位论文要求，一篇关于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研究的博士论文，不仅要理解当前国内外政治哲学研究的一般理论、熟悉当前国内外相关课题的研究现状，而且要在对“中国政治哲学”本身有融会贯通之把握的基础上，落脚于对具体研究对象的深入探讨。因此，在选题确定后，我对于晓东是否能够在三年以内符合质量地完成“徐复观殷海光政治哲学比较研究”这一课题还是有一些担心的。因为光是徐复观、殷海光二先生的著述加起来就有上千万字，要想读完就费时不菲，“比较研究”更是谈何容易！好在晓东的确是一个踏实勤奋、好学深思的优秀青年学子，三年下来，不仅阅读了数百本著作与大量学术文章，而且最终写出了二十

多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在我看来，晓东的这篇论文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值得称赏的。

第一，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观念框架下，在学界有关工作的基础上，尝试从多方面对徐复观、殷海光政治哲学思想进行了有一定系统性的梳理和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对两者的思想定位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在此之前，学界对于徐复观、殷海光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已有相当成果。晓东的这篇论文则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徐复观、殷海光政治哲学思想的基调，从“个人与社会”、“以自由为中心的政治价值”、“德治、法治与合法性”等三方面展开了两者之间的比较，从而得以把学界讨论的一些相关问题进一步引向深入。顺此而进，论文还对徐复观、殷海光政治哲学的思想定位这一问题进行了具体的探讨，在细密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得出了徐复观、殷海光分别是中国自由—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结论。应当说，这一定位是有新意的。

第二，以徐复观、殷海光为案例，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现代思潮中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家与自由主义西化派之间在政治哲学方面的复杂关系，较为系统地揭示了新儒学中政治自由主义传统的逻辑结构与基本理论特征，加深了相关认识。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虽然大多认肯现代新儒家在政治层面趋于自由主义这一事实，但却对其与自由主义西化派之间在政治哲学方面的复杂关系缺乏充分的关注。晓东的这篇论文则从多方面具体讨论了两者之间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在此基础上，这篇论文进而从“新儒学中政治自由主义传统的界定”、“性善论：新儒学中政治自由主义传统的人性论依据”、“人格主义：新儒学中政治自由主义传统的社会哲学依据”、“寻求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平衡的自由观”、“注重社会公正的平等观”以及“寻求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的社会政治治理模式”等诸方面，对“现代新儒学中的政治自由主义传统”问题作了论述，较为系统地揭示了其逻辑结构

与基本理论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相关研究。

第三，通过从个人、社会与普遍三层次对徐复观、殷海光思想及相关理论问题的分析与比较，对“中国文化传统与自由主义”这一学界相关研究的焦点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具体的讨论，更为细密地梳理了传统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中国文化传统与自由主义”既是胡适、殷海光、林毓生等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与徐复观、杜维明等现代新儒家所共同关心的话题，也是在目前学界的相关讨论中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晓东的论文借助美国学者约翰·凯克斯（John Kekes）所提出的“三层次”理论作为处理传统与自由主义关系的理论平台，通过在不同层面上梳理、分析与比较徐复观、殷海光所分别代表的不同的思想进路，更为具体、深入地探讨了中国文化传统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

由于政治哲学研究本身具有的难度，由于徐复观、殷海光政治哲学思想特别是其比较研究的复杂性，尽管晓东的论文在同行评议和答辩中得到了一些前辈学者的好评，但是也存在着一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曾经给晓东提过两个方面的要求与他共勉。第一是“回到事实本身”，第二是“双向诠释”。前一个方面是强调，相关研究不能紧紧停留在文本、范畴之间相互诠释与推演的层面，而是应当超越既有的、已经物化的那些文本、范畴，回归到对于“原初事实”本身的思考。具体到这一课题，就是要回归到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基本规范是何以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回归到中国现代合理的政治哲学与政治制度建设的历史起点上，面向政治哲学所面对的原初问题，以高度的理论思维来进行原创性的思考。后一个方面是强调，为了更为合理地在中国政治哲学之间展开比较研究，必须是既以西方政治哲学来诠释中国政治哲学，又以中国政治哲学来诠释西方政治哲学，以使双方在尽可能平等的对话中互相得到“澄明”；而不是简单的采取单向度的方式，或者以西论中，或者以

中论西，从而易于陷入一偏之见。从这样的要求来衡量，晓东的论文还是有值得改进之处的。

晓东的论文已经纳入厦门大学的出版计划，即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值此之际，我要向在晓东论文的写作、评审与答辩的过程中给予了多方指导、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吕希晨教授、张锡勤教授、周桂钿教授、宋志明教授、周可真教授和方克立老师、周德丰老师、韩强老师、严正老师、乔清举老师、吴学国老师等表示衷心的感谢！承蒙詹石窗教授等不弃，晓东获得博士学位后得到厦门大学哲学系工作。我相信，在厦大优越的学术环境的滋养下，晓东一定会在今后的岁月里，在中国哲学这块沃土上收获更为丰硕的果实！这是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的。

李翔海

2006年11月22日于南开园